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Исторія и будущность Теокртіи

神权政治的历史 和 未来

〔俄〕索洛维约夫

В. С. Соловьевъ

華夏出版社



Исторія и будущность Теокртiи

神权政治的历史 和 未来

〔俄〕索洛维约夫

В.С.Соловьѣвъ

钱一鹏 高薇 尹永波 译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委会

主 编：霍桂桓

副主编：林 信 鲁旭东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寅卯 王才勇 何卫平 张廷国 张百春 杨富斌
陈春文 陈 默 单士联 林克雷 林 信 强世功
韩东晖 鲁旭东 霍桂桓

F133/06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序 言

不辜负我们父辈的信任,我们要把他们的信念提高到有理性意识的新高度;指点明白,这古老的信念怎样从地方的特殊隔离和人民的自尊心当中解放出来,同时和全世界的永恒真理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著作的总任务。

关于这个神权政治问题的直接求出答案仅由我的全集第三册来做出贡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主观臆断和敷衍了事,需要为它搜集广泛的素材,用人类共同的通情达理的判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像在东正教教会的历史和《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本书第一卷的内容说明了《圣经》故事的哲理,在第二卷中阐明了宗教历史的哲学。

然而,如果本书的实质性的内容与神圣的宗教历史有关联的话,那么要确定这些问题的宗旨,首先要

以我们俄罗斯民族宗教意识本身固有的运动为前提。

俄罗斯的宗教思想家们过去和现在都势必要研究两个多世纪以前的基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十七世纪中叶俄罗斯正教会中的分裂运动,有很大的重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把教会分成东方的和西方的教会,而采纳那个《天主教的邪道》,这种邪道已被十一世纪拜占廷的善变者所揭露,并进入最终和邪道决裂的时代,那么我不客气地阐明一下这整个的事件,我认为这场关于《二指画十字》(俄国旧礼仪教派用食指和中指)和《特别的哈来路亚》(基督教,犹太教祷告时赞美上帝用语——译者注)的大论战是如此极度的轻率。众所周知,在当今这个时代争论的主要题目是关于死面面包和发酵酸面包的问题,然后是争论许多解不开的焦点,例如争论天主教主教们戴的戒指、是否允许狗进入教堂等问题。毋庸置疑,那时候的希腊人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且深信不疑,如果天主教徒们像希腊人一样也要求吃发酵酸面包,就像他们不让狗进入教堂一样,这种教会分裂仍然会发生,因为这种势力的借口是不会改变的。的确,在我们家庭的分裂中也还没有涉及到争论方面局部的焦点,而是涉及到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普遍问题。宗教的真理显示出了什么?教会的权利解决了没有?人民对古代的宗教是否虔诚?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在《尼康派教徒》和旧教徒之间,真的,曾发生过残酷而不可调和的纠纷。双方只在教会承认真理,然而,请问:教会本身在哪里?它的权力在哪里?它的核心在哪里——是在权力中还是在人民当中?希腊——俄罗斯某一阶层官员不顾人民赞成与否,甚至违背人民的意志,改变了他们原先的虔诚形象,残酷地迫害所有不顺从这种制度的人民。他们表现出教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们一身,一切特权无条件的属于教会,而人民只有惟命是从的义务。古老信徒派信徒怨声载道,说当局不按教规对待他们,因为画十字和祈祷词有等级区

别而使他们精神上受到折磨,我们那时的某阶层官员使用宗主教的吻礼,并给与闻名的誓言,“让我们向上帝宣誓:不使人民受苦,精神上不受折磨,我们愿为人民受苦,为神圣的教会受难,让你们心甘情愿地受洗!”显然,因为古老信徒派信徒不听从地方教会,所以地方教会的权利从属于“圣教会”的权力之下。因此古老信徒派也公然把保护人民的教会的传统凌驾于地方教会的权力之上。阿瓦库姆(一六二〇或一六二一,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作家——译者注)曾说过:“如果我比十分无知的人还要不善考虑问题,也会明白,圣教会的本质就是离开了神父,也是虔诚的和纯洁的。”

怎样解决这场大论战呢,真正的教会的力量在哪里呢:在法律的源泉里,是在上帝创造的权力中,还是在虔诚的人民心目中的祖先的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我们的主教假若是正确的,他们在教堂开始保卫精神上的权力,不过他们会在自己的这项工作中犯些错误;而分裂派教徒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也是正确的,既然他们证实了那时政权的行私舞弊和特别的贪脏枉法,并提出另一个全民必需的教会生活的起点。但是糟糕的是双方势必要成为法官,否则在这件私事中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双方没有考虑到(是的,在那个时代,按我们精神上的发展水平也不可能考虑到)一个普遍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中包含要真正解决整个争论。不禁要问:地方教会的俄罗斯人民用什么方法来接受全民教会对人民的影响?为了忠诚于全体教会传统又怎样对本土本土表示忠诚呢?从另一方面看:地方教会的某阶层官员有没有全民教会的权利?尽管他们已联合成一个大的地区主教会议,但还不是普世会议(基督教高级主教会议——译者注)。他们能不能宣布最后的决议和要求信徒无条件的服从?为了能够运用令人信服的宗教思想来自觉地评价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应当从处于闭塞状态的民族优越感中解放出来,扩大自己的眼界,用知识用技能迈进世界历史的

共同潮流。

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不能解决的我们这场教会争论恰巧发生在彼得大帝登基之前,并且早就替他改革辩护。在明智地最终解决教会问题新运动能取得成果之前,必须有某种临时解决教会问题的具体举措。如果古老信徒派信徒的领袖们使全体俄罗斯人民站到自己一边能得逞的话,那么实际上事情的解决对他们有利。他们没有保留隶属自己的政权,没有自己教民的牧师就不仅应该确认自己过分的追求——建立全民的教会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他们必须放弃自己肯定的合法权利,并且老老实实的归顺于自己的教民。但是这样的办法是否适当呢?按照敌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运动的原理,彼得大帝改革的全面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为了在世界上完成俄罗斯的宗教历史任务,必须要丧失俄罗斯的文化和科学。在政党的特殊统治下人民等待着的情景是怎样的呢?有这样规定的座右铭,“在我们面前进行,要真的这样躺下吧,永生永世”片面的等待制度的旗帜,未必就能如愿以偿,获得圆满成功,特别是处在这样黑暗残酷的时代。当这伟大而神圣的旗帜才升到有限的高度,只够给他遮盖麻杆和木架。

感谢上帝,俄罗斯从墨守成规中拯救出来,从中世纪教皇时代不及时的浅薄模仿中拯救出来。十七世纪教会分裂运动内部发生矛盾的片面起因,是为了解决纠纷,为了把我们人民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敌对双方的无能为力都暴露出来,尽管他们每一方都在致力于自身的努力。为了古老的虔诚形式绝对真正的不受侵犯,古老信徒派信徒利用分会从某阶层官员那里用强制手段取得祈祷仪式或者是原来最本质的礼拜仪式的部分形式,从日祷、所有的圣礼(除了洗礼)中取得。终于剩下了没有国外的宗教仪式而被承认的神秘的教会,他们应该满足了,因为他们抛弃了他们极可恶的尼康教的官员(俄国东正教总主教尼康在实行教会改革后所创建的新教

派——译者注)这个教派运用极不正确的和与古老的虔诚格格不入的仪式。这样的矛盾不是偶然的,或者说是莫明其妙的命运的戏弄。问题在于这些古老虔诚的热心捍卫者忘记了这种虔诚是以同意并且精诚团结在古老的俄罗斯组成的一个教会的神甫们和在家人为前提的。要是这种宗教制度的必须条件在分裂运动中破坏了,那么这里整个教会的体系就自然崩溃了。

这种宗教制度实际上是在主宰一切的教会里保持下来,因为大部分人民,如果没有一颗虔诚的爱心,那么按照信守不渝的宗教实际感情,人民会站到某阶层官员一边去。如果上帝的仁慈给俄罗斯人民保留了显见的教会福利,那么上帝的真理会在特别好的祭神捍卫者的命运中显示出来。捍卫者认为自己的教会力量在自己的权力中,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他们强占的。像这样独立而主要的宗教权力的意义显然是建立在全民内部宗教精神上的团结的基础上。当这种团结被破坏时,某阶层官员想用外部非宗教的手段支持自己的政权,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处在面对另一政权的依赖地位。正是这个宗主教伊奥阿基姆,他如此深知自己教职的特殊意义,他以十分宁静的心情,安详的态度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痛心呀,因为人民在说我们是异教徒。”因为这个贫穷的长老装成一个以前教会政权的衰弱的幽灵,只不过成为当时政权下别人手中无力的工具。

人民的喉舌疯疯癫癫地说他:“他是什么宗主教?他日子过得不错,睡好觉和吃好饭,爱护法衣和白僧帽,为什么他不揭发揭发。”此事的发生不是因为伊奥阿基姆和他的继任者阿得里安的软弱。继任者死后,某阶层官员的首领,他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氏族的人,这个人精力充沛,有主见,是一个驰名的大主教斯捷潘·亚沃尔斯基。在宗主教简单头脑中显露出那种简单无能的独裁政治,使斯捷潘·亚沃尔斯基的治理达到了一个自觉原则的水平,在他的神学论文中也得到了系统的

发展。在他的《信仰的基石》的最后一章中,斯捷潘·亚沃尔斯基论述:“那些侵吞公共财产的人是异教徒,因为他们非常贫困,虔诚的生活会使他们饿死,羊的生命为他们付出了代价,否则就像狼一样饿死。现实就是这样,虔诚只能使异教徒绝望。”他接着引用福音书中关于盗贼的事情,兹拉托乌斯特(四世纪拜占廷著名教士的外号)讲述异教徒的生活,斯捷潘最后的结束语是公正的审判斯塔特人(阿塞拜疆的少数民族)和盗贼处以死刑,这样对待异教徒是应该的。然后,紧接着出现一连串的论据,我们只援引两则这种论据:“长期的考验使人确信,对于医治异教徒毛病的别的办法,更确切地说,用死的办法……人们嘲笑异教徒被革出教门,说是没有闪电的雷声,因为他们不怕夺走财产……,治疗他们的毛病只有死。”“教会是神圣的,像掌握两个宗教的和人间的首领,好像两只手握住两把宝剑一样,彼此相辅相成。”在尼康(一六〇五~一六八一,俄罗斯正教会牧首)的管辖下,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蓄意地和明显地表现出官僚的独裁政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斯捷潘·亚沃尔斯基好不容易在自己的神学论文中下决心用两把宝剑为教会命名,就像给他两个人间的首领一样。他从一个闲着无事的宗主教,不管愿意不愿意成为彼得大帝创立的宗教委员会的无权主席,在这个委员会里,我们的教会政府作为在国王的最高权力下的一个国家机关部门——而国王是这个委员会的最高法官。

对历史情况公正而关切的见解不仅挡住了对改革者的不公平的责备,而且促使我们承认英明论证过的设置的机制,这种英明彼得大帝在重大事件中从来就很中用。宗主教制的运作不仅在此时需要,而且对俄罗斯的未来也肯定是有意义的。宗主教制之必须是因为我们的官僚的独裁政治在和分裂分子斗争中及对改革运动的反抗很明显地表露出无能为力。在分裂运动之后,宗主教制不具有内部巩固的基础,并且也有一部分人因为过分贪图而不可避免地在地盘让给别的机

关作交易,这个地盘更加适应他们创业的地位。而这种交换是有我们过去的历史根源,为了前途,这种交换有直接的好处,因为“善良勇敢的军官”,他们满怀信心照看着我们教会的事业,使新俄罗斯能够平安的受到欧洲的教育,他们在应该的范围内挡住了两个片面的、不成熟的宗教思想的流派,保护了我们“小学生年代”以免受到斯捷潘·亚沃尔斯基(一六五八~一七七二,俄国教会活动家、作家,一七〇〇~一七二一期间代理牧首——译者注)令人沮丧的观点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的影响是表面遵循宗教礼仪的人,如尼基塔·普斯托斯维扬特。对于那严正的道理不能不令人惊讶,决定这事业的是历史,或者说是天意更好。当我们教会的权力掌握在后来的宗主教手中时,实际上这种权力表现为走上了极端的官僚的独裁政治(在反对分裂方面)。实际上这个政权已经垮台,并且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然而,当这个政权依靠斯捷潘·亚沃尔斯基的两片嘴唇来遵循原则,为这个极端独裁政治辩护并想使他合法化时,教会政权的独立遭到合法的、理所当然的禁止,因为这些官僚本身的活动及默认,也都为改革事业辩护,并想使他合法化。

在斯捷潘·亚沃尔斯基时代和他的斯拉夫派历史学家尤·弗·萨马林的著作,教会问题在我们看不见的运动中留存下来。俄罗斯的智慧在善良勇敢的军官的保护下走进了欧洲的课堂,为了最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这个高年级的课堂(德国唯心主义)摆脱出来,用清醒的意识和必须的科学方法,重新倾注到那个十七世纪提出来的问题,但已不是决定我们教会命运的问题。

十九世纪初,在我们过去的教会学校里,我们还没有给教会下定义,教会就其本质来说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圆满的回答。甚至杰出的教会作家菲拉列特(约一五五四或一五五五~一六三三,俄罗斯正教会牧首、沙皇的父亲及亲信——译者注)像他这样又有智慧

又有才干的莫斯科都主教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关于教会的问题成为他有名的著作《关于东方教会的正教》这篇令人信服而审视的评论文章的主题。真正教会的完全形成取决于社会对基督的信赖和相信一个人的来世投胎。现在有许多这样的社会,但其中一些社会还处在分裂状态,甚至彼此敌视。所以都主教菲拉列特迫不得已地承认许许多多真正的教会,尽管他允许他们进入真正教会的行列,但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人类的虚伪,没有遵守同样纯洁的宗教有关的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他给了我们东方教会一个特权。但是他不承认我们有裁判别的教会的权力,像在东方和西方的教会之间已经发生分裂的状况下,他认为甚至召开普世会议(全世界教会代表大会)也是不可能的。在基督教,世界上存在不正常的关系,也许都主教菲拉列特的看法是最合乎情理及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为什么我们要承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并使他们都冷静下来,像莫斯科的圣者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用基督教徒典范的要求来衡量他的观点,那么在许多或多或少真正偶然集中起来的教会中——统一的神圣的全世界的信徒的教会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按照都主教菲拉列特的观点,整个活生生的基督教会的真实存在是这许多彼此分散的教会的社会的总和,这就是我看得见的,然而那个我们信任的统一的全世界的教会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确,莫斯科都主教在他自己初次发表的论文当中,企图引用这个观点,如果没有统一的教会思想,那么至少这种统一也是隐晦曲折的。根据这个主题他的思想流露出特别明显的缺点,这种欠缺正好反映出他的隐晦。丹尼洛夫的幻想是用金、银、铜、铁、黏土铸成的偶像——这种偶像用来适应都主教菲拉列特的有关全世界的教会的观点,这些偶像作为教会的历史演变形象化比喻。金子做的脑袋是教会,银子做的肢体是信徒,这符合最早几个世纪。当代的教会表现出偶像的阶段,它们是用合成钢和混凝土做成的。如果全世界的教

会像没有灵魂的偶像一样作为一个共同的表象，它清楚的表达了那种学院的机械论的僵化了的思想的形象，在这种神学院的笼罩下都主教菲拉列特尽管有无限的智慧，也不能在那样的气氛中提高自己的威望，那么这种详细的比喻关系到现在的教会，毫无疑问，各主教的诚实和妙趣横生都令人赏识。合成钢也好，黏土也罢——从当今教会的真实存在中能否找到另一种更恰当的形象？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种现实面前屈服，就像在某种令人生畏的厄运面前一样？我们能不能忘了那个生动的全世界的教会的有机的统一的典范？这种典范在向基督作至高无上的祷告时，留给我们作为宝贵的遗传。我们不应该掩盖明显的矛盾，我们是不是要在现实中寻找出路？

在那大牧师的年代，他的《评论文章》的三版、四版的出版商是个教民中的年轻人，他在莫斯科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与他的一些朋友谈论，极力通过看见的《合成钢和混凝土偶像》宣扬教会的真正实体，把它们下的定义不是看成死的静止的偶像，而是看成是活的在自己的意识中发展，不是通过人类意见的潜移默化，而是通过高层领导的深思熟虑，考虑自古以来教会本身固有的上帝的真理。

在尤·弗·萨马林（一八一九～一八七六，俄国哲学家——译者注）《关于教会的发展》的论文中，他作为二十二岁的青年对生活的初次体验，提出并解决的问题具有最普遍最有吸引力的特征。他已经不只局限于谈论一些错误和缺点，而是表现了黑格尔哲学对于他产生的十分强烈的影响。在这个青年的文章里，我们应该承认，他具有新生的未曾引人注意的思想萌芽，而对于我们俄罗斯的前途是中肯而有良好作用，具有结论性的，并且是伟大的。

尤·弗·萨马林后来拒绝表明自己最早的观点，并接受A·C·霍米亚科夫（一八〇四～一八六〇，俄国宗教哲学家、诗人、作家、政论家

——译者注)提出的公式,尽管不太有普遍性,但比较正确并有良好的作用。A·C·霍米亚科夫完全掌握了新观点的主要思想,正好作为生动的、实际上统一的普世教会的概念,他编辑了所有积极有益的内容。

自然,这个关于教会的概念,像关于真正的本质一样,不是无条件地重新创建我们的斯拉夫派(他们认为俄国的使命在于对抗西方,坚持自己的特性,保持彼得一世前的传统。这种思想在《圣经》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保罗(基督教神话中使徒之一——译者注)那里。父辈的创造发展缓慢,后来被天主教和新教的经济哲学所遗忘。这种思想在本世纪(十九世纪——译者注)恢复起来,并且被一些贝尔曼的神学家出色地加以阐明。但是为了今后的深入研究和这种思想的迫切实现,像普世团结一致尤为重要。这种思想不仅出现在东方,而且要出现在西方。这种思想引进我们的宗教意识里是斯拉夫主义,这是不可磨灭的功勋。

“教会不是学说,不是体系,也不是机关。教会是活的机体,真理和爱的机体。更正确地说,如身体一样的真理和爱。”尤·弗·萨马林如此确切地表述 A·C·霍米亚科夫和他自己的观点。在 A·C·霍米亚科夫所有的神学著作中他都提出一个题目,他接着说:“教会像真理的活机体,互相信任的爱,换句话说像团结当中的自由,自由当中的团结,自由在协调一致的教会中体现出来。”

教会的团结一致——霍米亚科夫在自己教理回答的叙述中说,……是从上帝赐给的团结中引出来的,因为教会不是个别人的多数,而是上帝赐与的统一体,它生存在理性的无惠的创造中。……教会的团结一致不是想象中的,也不是别有寓意的,而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就像许许多多的分子构成一个活的机体一样。

那么被我们分裂提出的问题:教会在哪里——在人民那里或是在政权手里——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新的答案:教会在那里,那里

的人民用兄弟般的爱互相联合在一起，他们志同道合，那里是上帝恩赐的场地，那里是真正的现实和教会生活的开端，形成教会的这个场地是在一个精神的机体里。显然，这种思想要求正确地识别神与人之间自发的教会社会现象。惟一的上帝恩赐本身是绝对不变的，但它存在于教会内，只能由倾心于天赐的人们自由地来接受它。也就是通过相互的爱和用这种爱的制约性促使人们实际地接受真理或真实的信仰。这人类的方向显然归教会管辖，并且不断修正和完善。假如教会从本身着手展示，这种全心全意的爱，这种爱必须完全地被接受和实现，并展现出基督的恩赐与真理——那么基督教的人类历史早就结束了。其实，尽管上帝的恩赐完完全全给与教会的人类，但是远非他们能够完全接受。神人的身体离基督的完美还很遥远，他只有一点儿爱，信仰的麻木、宗教的分歧还很厉害，这些构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一个共同的现象，并明显地呈现出教会思想上真正的矛盾。要弄清整个基督教里矛盾的事实，然后指出共同的出路，为了治好教民的这些精神上的毛病要给他们提供方法和条件，——瞧，这就是任务，这个任务摆在我们宗教思想家的面前，让他们给教会真正的本质下定义。

也许在这老斯拉夫派的时代，做这件事还不是时候。不管怎么样，他们在宗教问题上的主要代表是A·C·霍米亚科夫，他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而发言：把教会的分裂的事实提高到原则上，证明普世教会特别属于我们，属于我们宗教界，而整个西方世界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斯拉夫派的学说显然还有意识地自觉地系统地在复述那种危害极大的错误，我们的旧教派信徒由于眼界的狭隘，无知地陷入了致命的错误当中。

像A·C·霍米亚科夫这样著名的优秀的有才华的作家，为了讲一点礼貌，需要口才和说俏皮话。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给这种骇人听闻的论断以引人入胜的表达：“我们都站在绝对真理的立场上，而其

余所有的人都站在绝对荒谬的立场上。”从他自己的基本思想出发,真理只听任爱的摆布,霍米亚科夫为了保持自己的关于西方世界完全脱离霍米亚科夫的真理的论题,认为整个西方有毁坏爱的信条的过错,这种爱的信条在东方却丝毫无损地保留着。您瞧,他们臆想出不合乎道德的互相残杀的闻名行动;西方民族杀死贫穷的人、卑贱寒碜的人和充满温顺爱的拜占廷人——杀死他们,为了自己采纳西班牙人的君士坦丁堡象征带有 filiogue(一种信经,详见本书第一卷第五章——译者注)字的一种说法。在霍米亚科夫所有有说服力的、甚至充满激情的论文中得出这方面值得注意的题目只有一个:如关于在真实的历史中的这种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 filiogue 这个字什么时候收进拉丁文的,什么时候东方认识这个字的,最初怎样对待这个字,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字成为教会分裂的旗帜等等。这一切不重要,不需要详细论述?但是要声讨和反复谴责这种残杀,因此反对这一大半基督教世界。必须知道事件的情况,这种可怕的犯罪行为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是我们发现了什么?到处有谴责者的慷慨激昂的调门儿,而在历史事实的面前却又打退堂鼓,这种事实本身又如此自相矛盾,以致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纳闷儿:他在谴责谁?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的神职人员(他描绘他们最好用最黑的色调),“补充一点——按他的话说——容易解释阿里安教派(四~六世纪基督教教派首领——译者注)和天主教教徒斗争,其目的,希望把儿子登记上册,因为上帝不承认他为阿里安教派,可是一切都属于上帝”(霍米亚科夫文集卷Ⅱ,三二五页,布拉格出版)。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当然会把他们引向歧途,什么互相残杀的结论也做不出来。至于教皇,他们过了几个世纪,最后为整个西方教会确立了西班牙象征的一种说法,那么 A·C·霍米亚科夫本人在这方面向他们表示歉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没有权利过分严厉地指责罗马教皇,教